

首都博物馆丛刊



9

一九九四年



(京)新登字 085 号

主 编 马希桂
副主编 崔学谔
李铁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首都博物馆丛刊/首都博物馆编辑委员会编辑. —北京
:地质出版社, 1994. 10
ISBN 7-116-01724-0

I. 首… II. 首… III. 博物馆学-连续出版物-北京 IV
.G26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10910 号

首都博物馆丛刊第 9 辑

1994 年 10 月

首都博物馆编辑委员会编辑
(北京国子监街 13 号 邮政编码 100007)

地质出版社出版
(北京和平里)

中国地质大学轻印刷厂印刷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29 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2.25 字数: 290320

印数: 1—1000 册 定价: 15 元

ISBN 7-116-01724-0/K·74

1994 年 10 月第一版·1994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责任编辑: 刘 高 . 杜 翔
封面设计: 胡 徐

(真)

(假)

图一 西晋青瓷辟邪



图二 宋代兔毫盏



FH51/27

图三 康熙素三彩



图四 康熙豇豆红白太尊



图五 正德青花龙纹尊



(真)

(假)



图六 青花蒜头瓶

图七 清嘉庆龙袍



图八 清康熙年代梨园会馆碑

唐幽州村乡再探	赵其昌 (1)
长城博物馆展陈内容设计述略	唐国尧 沈平 (6)
试论中国古代货币理论发展概况	柳彤 (13)
明末清初北京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	梁志成 (19)
儒学改革理论初探	施建中 隋淑芬 (25)
洪钧评议	刘高 (32)
冀鲁边区从抗战到解放	李铁虎 (44)
从新政协到开国大典	季华 (50)

专题研究

关于燕国刀币若干问题的辨析	葛建军 (56)
唐李永定墓志考释	鲁晓帆 (61)
元初那摩国师生平事迹考	黄春和 (66)
从《练兵实纪》看戚继光督修蓟镇长城	孙五一 (72)
清代馆阁体之我见	徐伟 (76)
清代梨园馆探微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中有关文字辨析	杜翔 (81)

考古文物

葫芦沟祭祀遗迹初论	崔学谙 (87)
清乾嘉时京郊土地典押问题初探	刘瑾桂 (95)
新发现的《吴长庆闵泳翊等笔谈卷》	叶渡 魏三纲 (99)
董康书札考略	齐玫 (110)
从馆藏龙袍看清代皇帝服装特点	韩英 (116)
古瓷辨伪	刘树林 (120)
杂说鼻烟壶	徐瑞萍 乔红 (124)
漫谈唐卡	静轩 (130)
首博馆藏辽代银面具的文化功能试析	李琦 (132)
浅谈吴昌硕先生的两幅作品	李红叶 (135)
古旧字画的修复问题	魏黎瑾 (137)
北京法源寺石质文物的加固和保护	胡一红 (139)
浅论文物摄影与静物摄影	谷中秀 (143)

古都谈往

- 京师同文馆译书史略…………… 王宏凯 (146)
一九二八年的北平政局…………… 乐 薇 (154)
日伪时期北平孔庙祭孔活动述议…………… 武俊玲 (159)
-

地方民俗

- 首博馆藏《妙峰山进香图》所反映的
 妙峰山香会习俗…………… 李 澄 孙秀清 (165)
中国各民族民间禁忌异同浅说…………… 郭小铨 王晓侠 (168)
-

博物馆学

- 对博物馆改革中出现的几个问题的思考…………… 马希桂 (174)
略论博物馆社教工作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袁世贵 (180)
谈《毛泽东百年诞辰展》的陈列设计…………… 王晓侠 (184)
参观日本历史民俗博物馆…………… 程 旭 (189)
-

史苑拾零

- 乔治·布什参观首都博物馆…………… (18)
万里同志视察首都博物馆…………… (24)
人民中国邮票展现人民首都雄姿…………… (75)
民国北京驻军卫戍(警备)主官…………… (183)
班簋轶事…………… (188)
-

唐幽州村乡再探

赵其昌

首都北京，在唐代为幽州。1979年，我曾著文对幽州历史上所属村、乡试作复原，定名《唐幽州村乡初探》^①。初步探索计得：属蓟县者5乡，村7个；属幽都县者7乡，村12个。这些村乡，大部有定位，有的还可划出乡界并标明村址。资料来源，除文献外，主要依据北京房山县云居寺唐代石经题记与解放前、后北京地区出土的墓志材料。十五年过去了，北京地区又有唐代墓志出土，新的墓志与志石对幽州村、乡之复原、定界又提供了新的线索，与旧作《初探》核校，虽然大部乡界位置不变，但有些须作调整；又有新的村乡出现，须作新的补充。乃再作探索，并作草图示意（不按比例），以补正前文。

《初探》已阐明，幽州郭下治二县，西部为幽都县，属区在城西，兼及北部；东部为蓟县，属区在城东部、南部，今仍两县分述。

一 蓟 县

1. 燕夏（下）乡

《初探》对燕夏乡有定位，并划有乡界，乡名。定位主要是根据墓志所记与墓地位置而定。其乡邻：南部西邻幽州城垣，北部西邻归仁乡，今西四牌楼羊肉胡同曾出土“唐任希墓”，志石记地属燕夏乡，再西，阜成门迤西铁旗杆庙曾出土“唐陆日峴墓”，志石记地属归仁乡，因之，二乡之界当在羊肉胡同与阜成门之间划出（参示意图，图以实线示乡之实界）；广渠门曾出土“唐王仲堪墓”，志石记地属蓟县燕夏乡，但东部界邻不详；北池子北口曾出土“唐孙逊墓志”，志石记地属幽都县礼贤乡，乡界当在北池子北口以南划出，即北界为礼贤乡；南部乡界不详，曾约略划出。今有新的唐志出土，据之可修正南界。

1985年12月，永定门外四路通邮政汽车保养场出土：“唐赵悦墓志”^②，志记赵悦于“大历十二年（777年）十月十九日殁于蓟城东南燕下乡之原”，志石示明永定门外四路通唐时为燕下乡（志石夏下常互用），以之划界确切可信。此志的出现，比《初探》拟定之南界又南移1.5公里。

燕夏乡四界划定：北界礼贤乡（属幽都县），西界归仁、城垣，南界燕台乡，惟东界不详。乡属面积南北约6公里，东西约7公里以上，在幽州诸乡中属略大者。

2. 会川乡 从善村

《初探》对会川乡有定位，并有划界。乡名见于石经题记与墓志。云居寺唐人石经题记有“蓟县会川乡”的记录，但仅记县属乡名，不记位置；旧藏“唐敬延祚墓志”拓本记：敬氏“中和三年（883年）二月葬于蓟县会川乡邓村里之北原”，惟出土地点不详，对复原乡位造成困难。

对乡位曾有两处考虑：一是《元一统志》通惠河条记有“会川闸”，约在今西直门附近，地当幽州城北，“闸”与“乡”同名，为线索之一；再是乡有邓村，属蓟县，而蓟县乡属当在幽州城东、城南，为线索之二。德胜门外冰窖口曾出土“唐张建章墓志”，石记张氏“咸通八年（867年）葬府城东南七里邓村之原”，石后又刻识语称：“中和三年十月十六日自邓村原改葬于幽都县礼贤乡”，识语证明张氏是先葬邓村而后北迁的。府城即幽州城，邓村在城东南七里处，敬志又记邓村属会川乡，这两个邓村是不是一地呢？经过调查，今永定门外确有邓村一村（今已入市区，无村），其地又正当唐时幽州城东南约七里处，城东南又为蓟县所属，方位、里程、县属均相符，曾舍会川闸地而暂定位于此。今又有新材料为证。

1987年，永定门外略西之西罗园出土“唐曹朝宪夫人陶氏墓志”^⑧，记陶氏“太和元年（827年）十月三日葬蓟城（幽州城）东南八里会川乡从善村东北原”，从陶志可以认定，州城东南八里为会川乡，有从善村，以村西北准幽州城，方位、里程也都相符，证实了《初探》对会川方位的估定是正确的。

陶氏志石的出土，对会川乡划界仍有续补。1955年永定门外安乐林曾出土“唐姚子昂墓志”，志记姚氏“葬于幽州城东南六里燕台乡之原”，综合以上张、陶、姚志可知，幽州城东南六里是燕台乡，七里邓村、八里从善村，属会川乡，这一带正是二乡邻界处。兹据墓地作图示意：姚氏墓地安乐林，略偏东，西北距幽州城六里；张氏墓地邓村，地略偏西，西北距城七里，从善村在邓村之南一里，距城八里；如在安乐林西侧与邓村、从善村之间划线（以实线示意）作为唐时燕台与会川两乡旧界，当确切无误。会川乡西界邻广宁乡（见后广宁乡条）。

会川乡有从善村，为新见。

3. 燕台乡 东岗 高义村

《初探》记：1955年，永定门外（南）安乐林出土“唐姚子昂墓志”，志记宝应二年（763年）十月姚氏“葬于幽州城南六里燕台乡之原”，志石记方位、里程明确，安乐林一带为燕台乡，定位无误。城南为蓟县地，燕台乡应属蓟县。据乡位可见界邻：北界燕夏乡，西界会川乡，均如前述，西北是否达于城垣，暂存疑。燕台未见村名，今又有发现。

1989年8月，丰台区西罗园，发现“唐董长庆墓志”，记董君“大中十三年（859年）归窆于幽州蓟县之东岗燕台乡新莹”。西罗园地在永定门外西南侧，地望与《初探》划定之燕台乡位相符。东岗属燕台乡，或为地名，或为村名，姑作村名待正。

1985年，丰台区蒲黄榆方庄小区（焦家花园）发现“唐彭城夫人刘氏墓志”^⑨，记“大和七年卒，其年十二月葬幽府东南十里燕台乡高义村之原”，幽府即幽州之另称，蒲黄榆在西罗园之东，燕台乡正当城东、东南，证实方位无误。西邻是否达于城垣，不详。辖界东南至少十里属之，有高义村。

同地又有“唐周璵墓志”出土，记周氏“大中十一年宫于高义村之原”，石不记乡属，同地而葬，地属燕台无疑。高义村又一见。

4. 广宁乡 鲁村 姚村

1985年5月，丰台区槐房乡六必居酱园工地发现“唐王时邕墓志”^⑩，石记“会昌六年（846年）葬蓟县南一十五里广宁乡鲁村东一里之原”，墓地在今右安门正南约15里，地当

唐幽州城正南略东，其地为蓟县广宁乡，有鲁村属之。

广宁乡为新见，所属鲁村亦新见。

广宁乡之位置当无疑问，但乡界涉及会川、效德二乡，当作讨论。

《初探》曾记：1965年丰台区四顷三村出土“唐王郅夫人崔氏墓志”，记元和中崔氏“葬府城南七里姚村”，其地在今右安门外草桥，志石未记县属、乡属。

1982年，右安门外西三条出土“唐刘铃墓志”^⑧，志记“文德元年（888年）刘氏“葬于蓟县姚村北原之先莹”。

两个姚村，都在城南，当是一地，属蓟县。这一带有会川、广宁、效德三乡，它又该属哪乡呢？也即哪乡界邻城垣呢？细审会川乡名，疑与水道有关。幽州城西，原有大湖，今称莲花池，过州城东南注，上段称莲花河，下段称凉水河，西另有溪流来会，所经正当会川乡地，会川之名或取此义，且地处城南偏东，因疑会川乡与城垣接壤之可能性不大；幽州城南十五里为广宁乡鲁村，十里有姚村，如果鲁村为广宁乡之中，此界距城也仅数里，姚村应在乡界内，且数里之内不应再有乡属，则广宁乡应北界城垣。如此定界，广宁东临会川乡，北及城垣，西邻太平乡（见《初探》图示）。《初探》曾推定姚村或属效德乡疑误，效德乡位宜略南移。

广宁乡有鲁村，为新见；有姚村，应属广宁乡。

二 幽都县

1. 丰乐乡

1981年夏，京西海淀区钓鱼台东门外马路东侧发现“唐郭元贞墓志”^⑨，记郭氏开元十七年（729年）卒，廿一年（733年）“安厝于蓟城北丰乐乡之原”，是郭氏墓地所在之钓鱼台东门外一带为丰乐乡地，地在幽州城西北，志石虽不记县属，以乡位看，当属幽都县。

丰乐乡系新见，《初探》无此乡。度其乡位，东界归义乡，西界房仙乡，北界保大乡，南界太平或美锦乡。乡域范围偏小，与归仁、归义相若。

丰乐乡尚无村名出现。

2. 幽都乡 石槽

1985年春，京西石景山区玉泉路东建筑工地发现唐代“纪公夫人张氏墓志”，石记张氏大中元年死于潞邑（今通县），同年“葬于蓟城西幽都县幽都乡石槽之原”^⑩。幽州城西为幽都属，墓地正当城西，地望相符，其地为幽都乡，东界城垣无疑。葬地近旁今仍有石槽村，村落占地面积42000平方米，居民1174口，唐时村名不改，距今至少有1100年以上历史了。

石槽村附近今有鲁郭村（或作鲁谷），《初探》记：鲁郭辽代为房仙乡属（据辽韩资道墓志），唐代因之，又属房仙乡。城外村乡名、属，如无特殊原因，一般无大变化，辽之房仙前承唐代，可知鲁郭当是唐村。今石槽在鲁郭东南二里，如在二村之间划乡界以为唐代幽都、房仙二乡之旧界，当距史实不远。

幽都乡、石槽村均为新见。

3. 正统乡 胡堡

1981年，丰台区大葆台南一里铁路边发现“唐田公夫人阳（杨）氏墓志”^⑧，志记杨氏于“永泰二年（766年）葬蓟城南廿里正礼乡胡堡”。墓地正处幽州城南略西，方位与志石所记相合，其地为唐时正统乡无疑。志石不记县属，以方位计当属幽都县。应注意：“廿里”是志作者之估计数字，不能作为距城之实际里程。如以今里计，当在25里以上。在目前所见诸乡中，是距幽州城最远的乡属之一。

正统乡名，以前未见记录，为新发现。胡堡村亦新见。今附近已不见胡堡村名，略西南数里，今有狼堡，再南有葫芦堡，皆永定河下游沙淤滩地，或为胡堡之音转，也可能是胡堡旧地。

三 小 结

幽州村乡，再探既毕，小结如下：

- 1) 蓟县乡属原定个别乡界略有变动，新增广宁乡，又增从善村、东岗、高义村、鲁村。
- 2) 幽都县部分乡界略有变动，新增丰乐、幽都、正统三乡。又增石槽、胡堡二村。

《太平寰宇记》卷六九记幽州蓟县二十二乡，幽都县十二乡，《初探》复原蓟县计燕夏、会川、燕台、招贤、归仁等五乡，今新增广宁，共计六乡，距二十二之数尚远；幽都县复原计礼贤、房仙、保大、归义、太平、相公、美锦、效德等八乡，今新增丰乐、幽都、正统三乡，共计十一乡，已接近原数。

《初探》中两县复原共十八村，今新增六村，共计24村，两县原有村数不详，估计绝不止此数，缺的尚多。

虽然对幽州村乡两作探索，乡属村位，名实不符者，当还不少，只能待今后有新的发现，再作补正。

附记：新出土墓志，多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诸先生经手、发现，承蒙提供，谨表谢忱。

注：

- ① 《中国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 ②③④⑤⑥⑦ 《北京考古四十年》第三章第三节第130页—133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
- ⑧ 《北京市石景山地名志》聚落地名篇第25页，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 ⑨ 《北京考古四十年》第三章第二节第128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

长城博物馆展陈内容设计述略

唐国尧 沈平

长城博物馆的基本陈列，是以长城为素材，展示长城悠久的历史、雄伟的建筑，以及长城区域内历史上各兄弟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融合、攻伐征战、传统文化艺术等等。内涵广博，资料丰富，陈列大纲的写作，无疑是一项复杂艰辛，并且科学性很强的工作。目前国内以长城为专题的博物馆，现已建成开放的有山海关、嘉峪关和黄崖关三座。另外，辽宁博物馆、内蒙博物馆、甘肃博物馆、敦煌博物馆等，也不同程度地辟有专室或专题，用以展示本地区的长城。如何能使长城博物馆在现有的专题馆中脱颖而出；又如何能使长城博物馆在融会贯通全国各地长城内容的基础上，既能突出北京而独具特色，又能把博物馆展陈的知识性、趣味性和观众的参与和谐地融合在基本陈列中，这对陈列大纲的写作，提出了更深更高的要求。从长城博物馆展厅破土动工开始，文物资料的征集和复制也就开始进行了。大纲的写作，自纲要、初稿、二稿、直到定稿，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又从复杂到简炼这一“否定之否定”的质变过程，实践证明，目前博物馆的展览陈列，内容设计已不再仅仅限于文字编撰和资料罗列，而逐渐发展为综合诸多学科领域的边缘学科。在已进入高科技时代的今天，陈列内容设计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和素质，亟需更新和提高，以适应这新的挑战。同时也为博物馆的展览陈列从以往旧的框架和模式中走出来，创造了契机。

展览陈列的主题，是整个展陈的灵魂，也是展陈工作中最首要的问题。在《长城博物馆基本陈列大纲》写作开始之时，筹备组人员便就展览的主题进行了探索，最后一致认为：把这一具有丰富内涵的基本陈列定名为《长城》。

长城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建筑工程，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前后有二十多个诸侯国与封建王朝修筑过长城，几乎持续了两千数百余年。总长度在十万里以上，约能绕地球一圈半。南自长江流域，北抵蒙古高原；东起海滨，西抵罗布淖尔沙漠。大半个中国的领土内，都有长城遗址的分布。然而，长城的伟大，不仅仅在于规模宏伟和历史悠久，更重要的是，长城是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和智慧的象征。万里长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举，是世界上规模最宏伟的古代建筑工程之一。长城所经，不是茫茫沙海，便是崇山峻岭，修筑这样一个气势浑雄、延亘万里的工程，在千百年前生产力那样低下的当时，就凭双手来完成这样艰巨的工程，不知要克服多少难以想象的困难，更不知有多少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因此，长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精神和勇敢、顽强、不可征服的象征。登临气势磅礴的万里长城，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从秦开、李牧、蒙恬，到戚继光、袁崇焕等长城历史上的无数功勋人物，也会联想到“昭君出塞”、“苏武牧羊”、“文姬归汉”等悲壮诗篇，更会联想到昔日兄弟民族在长城沿线关市上

互通有无的友好情景。长城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除春秋战国各诸侯国修筑的长城外，汉族所建的王朝，修筑有秦、汉、隋、唐、明长城；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所建的王朝，修筑的有北魏、东魏、北齐、北周、辽、金长城。长城并不专属于某一民族，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财富。

长城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它在中华民族发展的长河中，始终是大半个中国民族融合的强大纽带，其规模之大，历史之久，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条纽带正处于中原农业文化同北方草原文化交错融汇的地方，不仅是中国文明和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也是不同文化类型民族交流与融合的区域。春秋以来各诸侯国所修筑的防御体系，到秦完成霸业后连为一体，秦汉王朝四百余年的统治，沿万里长城屯田戍垦，创造了匈奴人与汉人交错杂处，相邻交往的环境。乌桓、鲜卑等族也先后进入长城区域，魏晋以来边地各族大量内迁，形成长城区域各民族大流动的浪潮，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为直接。经北魏、北周初步完成的民族融合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初步统一，奠定了隋唐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建和封建经济的繁荣。这一时期涌入长城区域的许多古代民族，如：匈奴、东胡、羌、羯、氐、鲜卑、乌桓等，在以后的文献记载中不见了，其语言、服饰、姓氏、经济、文化，都溶为一体，在中华民族灿烂历史文化中闪烁着不朽的光芒。辽、金、元时期五百年之久的边族内迁和民族战争，是又一次少数民族涌入长城民族纽带的历史时期。其西部有党项、回鹘、塔塔尔、汉等民族进行着局部地区的民族融合，而中部、东部则有渤海、契丹、女真、蒙古、汉等，在更大范围、更深的领域内进行着交流融汇。在明统一后，和平相对安静的环境中，更加快了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虽然明代防御的重点是北方的鞑靼、瓦剌、女真，并大规模修筑长城，“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①。但是并未能阻断长城南北各兄弟民族间的和睦相处和友好往来，各族人民对长城地带的经营开发，更加深了民族融合的力度。丰州壁的开发，正是这一历史事实的例证，隆庆五年（1571年），明政府封阿勒坦汗为“顺义王”，驻守大青山丰州川，其时宣化、大同等长城沿线许多地区明令开市贸易，各族友好往来交流日益加强。而边内因土地兼并高度集中，屯田制度的破坏，失去土地的各族劳动人民、戍屯军卒，以及败露后的秘密会党成员，“罪犯”等，不断涌向塞外草原上的丰州川，成为开发内蒙南部及河套地区的一支重要力量，其“逃出边者，升板筑垵，盖屋以居，乃呼为板升，有众十余万。南至边墙，北至青山，东至威宁海，西至黄河岸，南北四百里，东西千余里，一望平川，无山坡溪涧之险，耕种市廛，花柳蔬圃，与中国无异”^②。流民与蒙古族人民一起，对以丰州壁为中心的草原地区的开发，为各民族的交流融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更为以后三娘子兴建呼和浩特城，打下了基础。呼和浩特城正是长城民族融合纽带带上各民族友好交流，共同开发丰州壁结出的硕果，是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象征之一。

邓小平同志于1984年9月向全国人民发出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号召，高度地概括了长城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物质表征，具有中华民族象征的意义。长城博物馆展陈的主题，就是展示万里长城的丰富内涵，中华民族团结凝聚、勇敢智慧的象征。因此展陈素材就不仅仅是城墙、关塞、敌台、烟墩；也不仅仅是烽火狼烟，攻伐征战；而应是无论是长城的历史、军事、建置的陈列，还是经济、文化、艺术等部分的展览，都要以体现我们民族的智慧、勤劳，表明各兄弟民族间长期团结友好、交流融合为主。只有这样，长城博物馆的展陈才能称得上是“第一流”，才能在诸多专题馆中独具特色。也是在这样一个主题下，才

能再考虑展陈的知识性、趣味性及观众参与。而大纲的写作，也正是在这一主题下，才能科学地、有效地进行。

二

基本陈列大纲在鲜明地展现主题的前提下，共设七个专题分别展陈主题所包含的各个侧面的内容，即：历代长城、明代长城、建置武备、长城征战、经济文化交流、民族艺术宝库和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前三个专题所要展现的是长城历史和建筑构造、武器守御装备。陈列长城的产生及原因，万里长城的出现，历代封建王朝对长城的修筑情况，长城的分布，明代长城在长城史上的地位，明代长城的修筑，明代长城九镇的设置、北京地区明代长城的雄伟气势，以及长城的具体构造和装备设施。总之，是在主题的贯穿下，表现长城的主观效应，即就长城的本身来体现长城。第四、五、六个专题，所要展现的是在长城产生和发展的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围绕着长城发生的攻伐征战，长城内外各兄弟民族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交流，各民族间的汇聚融合，以及各族劳动人民屯田开发并创造出的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总之后三部分专题也是在主题的贯穿下，而表现的是长城的客观效应，即长城更深远的内涵。在陈列大纲内容分布比例中，明代长城占全部陈列内容的四分之一，而北京地区的内容又占明长城的三分之二。这里并不仅是“明代长城”这一专题在陈列大纲中的比例，而是明代长城在各个专题中的比例。北京地区长城内容的比例，也是如此分布的。固然，具体的事物要具体地分析，“历代长城”这一专题，就没有明长城的内容。北京地区长城的内容，也仅是北齐长城，北宋地道等。明长城作为一个专题，共占两个展厅，其后明长城的建筑结构和武器装备，也属明代长城的内容，占居一厅。总之是用三个展厅的面积来重点突出明代长城，展现至今保留最完整的这段万里长城的雄姿、分布、兴建、建置、武备等。北京地区的长城是明长城的精华，最能体现万里长城的所有内涵。这三个展厅的主要图片、模型、文物标本，都是围绕着北京地区的长城进行重点陈列。大纲的后半部分，是长城的经济文化和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涉及的内容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较前半部分重要。其内容的比例，仍是以明长城为主，突出北京地区的内容。尽管在陈列大纲写作过程中几易其稿，尤其是后期进入形式设计和制作阶段时，许多展陈内容由于种种原因，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删减或合并。但是陈列大纲在整体上仍然保持着原有的风格和特色，即主题鲜明、贯穿始终，明长城为重，突出北京。既反映上下几千年，纵横十余万里的长城历史、经济、军事、艺术；又突出万里长城，尤其是明长城，着重展现北京地区长城宏伟壮观的建筑和防御作用，给人们以爱国主义教育，激发人们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弘扬中华民族几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

展览的第七个专题，是“爱我中华修我长城”，这也是整个展陈中最主要的部分。由于万里长城具有中华民族象征的意义，所以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和重视。在长城完成了历史上的军事功能后，现已成为最好的，不可取代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堂。“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不能仅仅理解为就是文物保护，就是修复已毁或濒临消失的长城遗迹，更应当认识到，万里长城在教育、科研、旅游等方面的价值，更应当领悟到，万里长城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物质表征。“爱我中华”是我们千秋万代永恒的主题。在大纲的写

作和投入形式设计工作时，许多同志曾提问，长城博物馆展陈的几个突出和重要之处都知道了，那么哪一部分是整个展陈的重点和高潮？哪一部分又是重中之重呢？回答是明确的：整个展陈的主题就是“爱我中华”，“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是整个展陈的重点和高潮，是重中之重。无论是历代长城、明代长城还是经济交流、艺术宝库，也无论主观上的长城，还是客观上的长城，所要展现的，应该体现的，都是一个目的：“爱我中华”。“爱我中华”贯穿长城博物馆陈列的始终，并在第七个专题中，得到最充分的展现、升华。这样，广大的观众才能完整地体会到万里长城的伟大，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辉煌；各兄弟民族团结一致，永远凝聚在一起的真正原因；才能真正领悟到：万里长城巍峨屹立，延伸驰骋千万里，气势磅礴，是我们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伟大象征。

三

《长城博物馆基本陈列大纲》内容素材的选用，也是在鲜明地展现主题的前提下，科学、严肃地进行。展陈内容素材，就是用以展现主题的典型考古资料、历史文献、馆藏和征集的文物，实物标本、科研成果、图片资料等等。陈列内容设计人员通常所说的筹展中的文物拣选和资料整理，就是内容素材选用工作之一。展陈内容素材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直接入展；一是以此为依据，设计制作成模型、沙盘、场景，以及图版、创作画、临摹画、塑像、造型等等。在此基础上，按照展陈形式设计的要求，综合各种辅展设施，直观的展览陈列就成型了。因此，内容素材的选用，是展览陈列知识性、科学性、思想性、趣味性的基础和保证。

在长城博物馆展陈内容素材选用过程中，争议较多的首先是“历代长城”中“长城产生前的防御设施”这一节。那些史前文化遗址中的壕沟、商周古城遗址中的夯土墙，究竟同万里长城有着什么样的联系？作为长城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为什么不从春秋战国时开始，反而上溯到原始社会的末期？筹备组同志经过反复研讨，最后统一了认识。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军事防御工程，是原始社会末期，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初期，数千年长期备御实践的产物，是古代城堡建筑的扩展。正如长城学专家所说：“长城无非是城墙的延长”。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私有制的出现，掠夺财富和奴隶已成为经常，迫使人们利用天然障碍或构筑人工障碍，来保护自己的居住地。选用西安半坡遗址照片，展示距今六千多年前的壕沟，是中国最早的防御工程。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照片，说明殷商时期已出现较为先进的人工障碍。史载这一时期的防御设施有两种，即“封树”和“土墉”，封树即打桩入土；土墉即掘沟引水，堆土起墉，至周则分封，城邑棋布，形成拱卫周京的环形防御体系，“凡国都之境，有沟树之固”、“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北京地区长城内容是展陈重心，房山镇江营、琉璃河两处遗址照片所展示的内容，正是这一时期防御设施的典型，也是万里长城起源和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实物资料。上述几幅遗址照片，若用于通史或北京地方史的展览和图录中，则表示它们直观的、固有的大部分含义；而用于长城馆展陈，是让观众能了解到长城的起源和面貌，更进一步完整地领悟到长城从原始聚落的壕沟、土墉，进而至商周时期寨堡城邑的点式防御，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线式防御系统的基本线索。虽然这一部分的内容并不是整个展览陈列的重点，但是作为长城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应能体现万

里长城的起源与发展,展现长城所包含的上下几千年中华民族辉煌历史,应能基本表示出万里长城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从点到线,从线到面,直至发展到镇、关、隘、口有机结合,堡、寨、台、墩互为角犄,形成完整防御体系的大致脉络。大纲定稿时,最终还是保留了这部分展陈素材。

内容素材的选用,也决定着展陈形式的风格与气氛。通过“历代长城”这一专题内容设计的实践,进一步证明了这个论点的正确性。纵观明代以前历朝所筑长城,其中规模最大,修筑长度超过万里的是秦、汉两个朝代,秦长城一万余里,汉长城两万余里,春秋战国时期的长城,多为诸侯兼并战争而筑,其燕、赵、秦长城虽为防匈奴,但工程及规模远远不及秦汉长城。而北朝、隋、金等长城,无论从军事效应上,还是从工程质量上,也不可同秦汉同日而语。因此,秦汉长城是历代长城之中心,而又以汉长城内容为重。在鲜明主题,充分考虑到历代长城,尤其是秦汉长城在保卫中原地区的封建文明、推动边疆经济开发、调节民族关系、促进国家统一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的前提下,内容素材的选用依据历代长城的性质、特点,大多带有浓郁的戈壁沙海和朔漠草原气息。在以汉代居延遗址考古资料为依据而制作的“汉代烽燧”模型为中心的“历代长城”厅内,沿主线以及辅线所设展品,均是来自今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地区的素材,诸如:大青山上的战国、秦、汉长城,阴山地区的岩画,罗布泊中的白龙堆,戈壁滩上的汉烽燧,东蒙草原上的金界壕,还有居延遗址中的汉简、转射、封泥,鄂尔多斯草原的青铜器等等。直接地就给人那种“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粗犷淳朴的气氛。当然并不是说辽东黑土地上就没有历代长城工程,内容素材所选标准,仍然是围绕主题、突出典型。尤其是汉代长城与秦代及历代长城有所不同,它是与商人地主政权武装征伐的西进相配合,不是防御设施,而是一种前进政策的工具。其东部大抵是复秦时塞,巨大的工程是西展,几乎接上了天山。汉代长城遗址、文物和汉简的发掘,不仅丰富了开河西、筑长城、列亭障的历史内容,并且使在古典文献之中无法考证的烽燧制度重现光明,据此,“汉代烽燧”模型就成为“历代长城”之中心、重点。决定着“历代长城”与其它几个专题在风格和气氛上有所不同,这里并不是指具体展陈制作格式上的风格、展版、展柜、文字规范等等,还是要整齐划一。以明长城为例,地理位置上较秦、汉长城平均向南移300公里,其最精华段落起伏于燕山山脉的奇峰峻岭之中,且又以砖裹,气氛上则是雄伟险峻,色调上自然是淡雅的青灰。或曰明长城亦驰骋于黄土高原、河西走廊,除却“四镇三关”,还有雁门、偏头、嘉峪等关驰名中外,其风格、气氛、也可与“历代长城”相同。还是像前面提到的,展陈的主题、重点、各专题的突出之处,都已论证确定,内容素材的选用,就在这一基础上完成。同时,也避免了展陈从头至尾千篇一律,使各专题在统一展现主题旋律中,分流合注,各领风骚。

展陈内容素材选用,是主题实现于形式的第一步,有什么样的内容素材,就有什么样的陈列形式。“明代长城”和“建置武备”两专题的内容素材选用,进一步证实了展陈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明长城内容,是长城馆展陈中心,内容与形式的质量,直接关系到长城馆筹备建馆的成功与否。以怎样一条展线,铺设什么素材,才能完整、准确地展示明代长城的历史风貌、九边分布、建筑特色、防御设施和军事装备。又怎样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精选提炼出展陈素材,相互有机结合而又各具典型特色,整体上宏扬主题,具体各自显其客观内容。这是陈列设计人员的任务。历经几度增删,反复推敲,大纲定稿时的明代长

城内容共分两大专题：“明代长城”和“建置武备”；含四个章节：“明代长城的修筑”、“九镇”和“长城的建筑”、“明代长城的武器装备”。“明代长城”中，“明代长城的修筑”一节所展现的是历史过程，内容素材的构成具有时间上的不可逆性，决定着展陈主线及展品的排列顺序与空间。对有明一代二百余年的筑城史，采用的是“以人物代事件，以事件代过程”的设计手法，以点代面，集中三个阶段建立展陈主线，概括出从明初对残元势力以攻为守战略，转变为正统以后的单纯防守，再进而成为嘉靖以后的守不胜守，这样一条明代为防御蒙古修筑长城的基本线索。铺设于展线之上的内容素材，按时间顺序，自成祖北征、徐达筑城、土木之变、保卫北京、庚戌之变，戚继光练兵，直到闯王进京，清兵入关，从而烘托出这一展厅内中心场景模型——戚继光督修蓟镇长城。“九镇”则不然，采用“横向罗列，齐头并进，突出一段，兼顾全线”的方式，将明代九镇长城，均依从东至西，由北向南的规制排列，突出蓟、昌、真保诸镇，中心设置“四镇三关”长城模型，这也是定稿后长城馆内唯一的一座可展示三千公里以上长城风貌的立体景观模型。这样形式的内容设计，不仅可使万里长城完整而又有代表性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并且能在最精彩的段落中以三维空间的模型展陈形式得到艺术升华。“居庸关复原模型”、“沿河口所复原模型”均铺设于“四镇三关模型”展区内，以充实与突出北京地区长城的内容。“建置武备”中“长城的建筑结构”，属建筑工程工艺学范畴，其内容是长城馆陈列中最富知识性和趣味性的部分。虽不受时间顺序的限制，但却有类别方面的要求，墙、堑、台、空，既要相互联系，又各自有其内容，不能混淆，需以“各成体系，兼顾整体”的手法，进行内容设计。“明长城的武器装备”，是在一具体空间里设置一综合实战模型，虽不拘泥于某一战役之场而，但长城攻防所用冷兵器、火器，均按文献记载复制，配置在场景模型中，给人们一种如身临其境之感，对长城武备能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可见，明代长城的内容素材选用，或在历史过程、时间先后上有严格的顺序要求；或在地理分布方位，区域组合方面有具体的要求；或属于对长城各具体局部组成部分作知识性介绍，有类别上的划分限制，因此决定着这一部分的形式设计方式也不能千篇一律，而要依据内容素材的要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形式服从内容。这在明长城内容设计工作中，再次得到证实。

展陈内容素材的选用，在现代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对陈列内容设计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现实性与迫切性，在长城馆陈列后三部分专题内容设计中，得到充分反映。“长城征战”所表现的是围绕长城所发生的历次著名战役，即万里长城的军事效应。在几千年长城史中，各族间的战争总是暂时的，而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相互融合则是主流。作为长城馆的陈列，主题是明确的，因此，这一专题在内容素材上删减、精选，在气氛、风格上淡化，所有战役均采用线条式示意图，以过程为主，以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为主，辅以创作画或遗址照片，而浓笔重墨，用在“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艺术宝库”两专题上。这两专题内容素材的选用，直接反映陈列主题的主要方面，其意义在本《纪要》前面已叙述过，这里要谈的是关于内容设计同各边缘学科的联系。反映经济文化内容的陈列，仅仅从现有的古籍文献中找寻素材是远远不够的，也不能科学完整地设计出直接的，立体的展品奉献在观众面前。越是久远的年代，文学记载越是稀少，必须运用考古发掘的成果，订正文献史料之伪误，补充之缺乏，这是历史学科的任务。而运用这些方面的成果，使考古学与历史学结合为一，实现于展览陈列，这是陈列工作者的任务。以“丝绸之路”模型为例，由于秦汉长城的考古发现，指明汉长城不仅终止于酒泉，而罗布泊沙